

# 论刘裕政治军事集团的构成

范伟军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文博学院, 重庆 400047)

**摘要:**东晋末年,朝政夷陵,世族衰落,寒门庶族乘时崛起并以刘裕为核心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随着该集团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其内部不断分化;另一方面,它的世族化趋势不断强化。

**关键词:**刘裕;庶族;世族;东晋

东晋后期,门阀士族垄断的统治政权全面走向崩溃,在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刘裕在镇压孙恩、卢循起义中崛起,控制了东晋政权,最终取而代之,建立了南朝时期第一个王朝——刘宋政权。本文所论述的是庶族集团及其代表在士族门阀的强权下兴起与取而代之的艰难历程。

—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人,世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今江苏镇江市东丹徒镇)。《宋书·武帝纪》称其为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而时人今世颇有微词:《魏书》称“其先不知所出,自云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项,改为刘氏,然亦莫可寻也。”<sup>[1]2129</sup>唐长孺认为“彭城刘氏是出于汉朝皇室的大族。刘裕自云出自彭城一系,这是当时寒门攀附士族的惯例。”<sup>[2]135</sup>刘裕虽出身寒门庶族,<sup>[3]</sup>但自幼丧母,父亲又早死,家境贫穷,以“伐荻”、“渔樵”、“躬耕”诸事,艰难度日;然而“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继母以孝谨称。”<sup>[4]1</sup>正是早年的这些磨砺造就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处变不惊的人格品质。

刘裕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孙恩事起,前将军刘牢之请为参军,前往征讨。刘裕胆识过人,作战勇敢,“高祖常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战辄摧锋陷阵”,<sup>[4]2</sup>又善用奇兵,常常以少胜多,他的军事才能初露端倪。更难能可贵的是“于时东伐诸帅,御军无律,士卒暴掠,甚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sup>[4]2</sup>刘裕初出道便显示出了锐不可挡的霸气和“仁义之师”的王者风范,为他日后的晋身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威望。401年刘裕以军功被封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

刘裕有勇更有谋,以其超人的才智脱颖而出,在刘牢之政治上摇摆不定(先反司马道子父子,后反桓玄)的关键时候,他准确预测了事态走向并予以固谏,以后逐步成为刘敬

宣、何无忌等人的依靠和核心,在东晋末年的军事政治舞台上从配角开始走向主角。

402年桓玄入主建康后,重用桓氏一族,大肆诛杀以刘牢之为代表的北府兵中上层将领。牢之虽诛,然北府人物未尽,是时刘裕已经成为其首领。桓玄对他虽有所猜疑,但为巩固统治起见,又不得不起用以其为代表的北府兵中下层将领。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绝对不甘于只是充当桓玄的工具,他准确判断了自己的处境:“今方是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吾辈也”,<sup>[4]4</sup>决意徐图对付桓玄。刘裕行正守坚,东征卢循,“未尝一日弛其军旅之事也”,<sup>[5]458</sup>决岁之间,三破卢循,以功加彭城内史,桓玄的无能致使征伐大权逐步控制在刘裕手中。当桓玄“谋将篡盗”,桓谦试探刘裕的态度时,其从容对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sup>[4]4</sup>刘裕实欲“踞桓氏于炉火上邪!”但就是这句似是忠诚的话,令桓玄大喜过望,在刘裕随后随桓谦入朝时,桓玄“接待殷勤,赠赐甚厚”。在近人劝说铲除刘裕的时候,桓玄回答说:“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俟关、陇平定,然后议之。”<sup>[6]4</sup>这足以说明,刘裕已经成为当时政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桓玄欲倚之为心膂。

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刘裕的领袖意识日益凸显,他开始将一批文武将领结合在自己身边,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作为政治上立脚和壮大的核心。

这一时期为刘裕出谋划策的人物主要是孔季恭和刘穆之。当刘裕意欲在山阴起兵讨伐桓玄时,季恭认为“山阴去京邑路远,且玄未居极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衅成恶稔,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克”,<sup>[4]1531</sup>帮助刘裕确定了恰当的起事时机和地点。在攻占京口后,经何无忌推荐和刘穆之“货与帝王家”的自荐,遂聘穆之为主簿,“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sup>[4]1304</sup>刘穆之就成为了刘裕集团的首要谋臣,穆之“内总朝廷,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

\*收稿日期: 2009-01-06

作者简介: 范伟军,男,山东莒县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

应,不相参涉,皆悉贍举。”<sup>[4]1306</sup>于是“深谋远猷,肇基王迹”。与刘裕出生入死,唯其马首是瞻的将领有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檀韶、檀祗、檀道济、刘道怜、刘毅、孟昶、孟怀玉、诸葛长民、向弥、臧熹、刘道规等人,他们基本上属于寒门庶族,多世居京口,起家于州从事、主簿或参军、司马,很多本身就是北府兵的中下级将领,在东晋朝政陵夷,世族衰败的时代背景下,均有建功立业的强烈动机。“此数子者,气足以冠时,才足以经世”。<sup>[7]2218</sup>这些年龄接近,家庭背景和出身经历类似的中青年庶族代表,便以地缘(京口)为纽带、以刘裕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强势集团。他们视刘裕为乱世中的明主,将自己的军政韬略通过刘裕的行动变成军事、政治斗争成功的事实,进而加官进爵;刘裕也把他们看作是王业的基础和成功的保证。正是他们的支持,使得刘裕能够在重大转折关头抓住机遇,消灭异己,不断走向胜利。

## 二

刘宋建立者刘裕所处的晋末,是一个旧的统治秩序面临崩溃的时代。“物必先自腐也,而后虫生之”。孝武帝“不亲万机,嗜酒,流连内殿,醒日既少,外人罕得进见”,<sup>[8]3432</sup>最后竟因一句戏言被张贵人害死,年仅35岁。而当政的司马道子竟“不复推问”。继任的安帝是个白痴,“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sup>[7]267</sup>于是一切听任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摆布。道子虽贵为相国,但他“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重用卑佞小人王国宝之流,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sup>[7]1733</sup>可真谓是:“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sup>[7]243</sup>

这时“方州重于朝廷,是非决于牧督,相寻而乱”,<sup>[5]451</sup>在荆州、扬州等军事重镇握有兵权的王恭、庾楷、殷仲堪、杨佺期、桓玄为了各自的目的,扩充实力,连年举兵反叛,企图在条件成熟时取晋自立,东晋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走投无路。大权在握后,元显鉴于上游荆江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自己来指挥的新军,“又发东土诸郡(八郡)免奴为客者,号为‘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结果使“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sup>[7]1737</sup>这件事就成为孙恩、卢循起义的导火线。

孙恩、卢循于399年领导了反对司马元显为首的东西晋暴政的大起义,“及元显纵暴吴会(发免奴客为兵),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因袭会稽,一时八郡俱起,旬日之中,众数十万。”<sup>[7]2632</sup>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多方失利,北府将领谢琰、高雅之等先后失败,以王、谢为首的世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至于“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闭门相守饿死”者,<sup>[8]3542</sup>更是比比皆是。这样的背景为寒门庶族的出现和强大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社会空间,刘裕抓住了这个机会,在镇压这次运动中,崭露头角,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社会化历程。

《易经》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刘裕虽然“仅识文

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间所贱”,<sup>[8]3499</sup>但他终身“奉继母以孝闻”;<sup>[9]1</sup>在为刘牢之参军期间,多次对其进行直言规劝;不仅优抚伤亡的部属,而且对忠于其主的手也能加以照顾,如阵斩桓玄重将皇甫敷时,受其临终所托,“厚抚其孤”。<sup>[8]3563</sup>可见,刘裕能以封建社会的“忠孝仁义”等意识观念作为立身行事之基和选拔任用人才的主要标准,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知恩图报,重用故交知己。刘裕尚在草泽之中时,王谧“独奇贵之”,并为之代偿欠债,及镇石头,则力荐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谢灵运曾不顾桓玄性促急,而与刘裕共食完毕后方赴诏,及入镇建康,刘裕于百僚之中目之曰:“此明公孙也”,<sup>[4]1493</sup>即加擢拔。徐羨之曾与刘裕同府(桓脩抚军将军府),“深相亲结”,<sup>[4]1329</sup>举事伊始即版为镇军参军。刘敬宣为刘裕旧主刘牢之之子,且对裕有救命之恩,与裕“恩结龙潜,义分早合”,裕常“恩款周洽,所赐莫与为比”。<sup>[6]475</sup>而与刘裕有旧的向弥,“情味不浅”的王诞等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恩宠和重用。(2)奖宥忠孝,擢拔节义之士。吴隐之“事母孝谨,及其执丧,哀毁过礼”,为广州刺史后“清操愈厉”,后为卢循所俘,在刘裕和王诞的双重努力下,使得放还,寻拜度支尚书、太常。<sup>[7]2341-2342</sup>王弘曾为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簿,及玄“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尚在丧,独于道侧拜,攀车涕泣,论者称焉”,<sup>[4]1312</sup>刘裕召补为咨议参军。檀道济,“少孤,居丧备礼,奉姊事兄以和谨致称”,<sup>[4]1341</sup>最后被选为顾名大臣。在进讨桓玄时,朱龄石自言:“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军后”,刘裕“义而许之”,<sup>[4]1422</sup>甚加委任。胡藩能“直言于殷氏(殷仲堪)又为玄尽节”,<sup>[4]1444</sup>刘裕召为员外散骑侍郎,参镇军军事。

刘裕内化并躬行着这些封建道德观念的目的就是感召身边的忠诚于自己,以增强该集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而事实上刘裕的这种开诚布公和推心置腹也换来了部属的忠心拥戴:刘穆之,“竭节尽诚,无所遗隐”、“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凡所荐达,不进不止”;<sup>[4]1304-1306</sup>刘敬宣忠贞不二,刘裕赞之为:“阿寿(敬宣小字万寿)故为不负我也”;<sup>[4]1415</sup>在“刘毅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辏”的情况下,张邵却说:“主公命世人杰,何烦多问”,<sup>[4]1393</sup>故不往;刘毅族兄刘粹也是“尽心高祖,不与毅”;<sup>[4]1379</sup>刘毅的舅舅郑鲜之,也是“尽心武帝,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sup>[6]860</sup>受到礼遇而自以为遇到明主的武将们,更是身先士卒,宁折不屈。在北伐后秦时,王镇恶对刘穆之说:“吾等因托风云,并蒙抽擢,进咸阳不克,誓不济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锡不至,亦卿之责也”。<sup>[6]454-455</sup>《孝经·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刘裕与其幕僚之间的关系,既有礼遇与投报的回应,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格之间的相互吸引。

作为乱世之中的英主,刘裕既能唯才是举,拔人于寒微之中;也能容忍部属的瑕疵,做到用其所其长。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基本上能够做到放手用人,用人不疑。王猛之孙王镇恶,“意略纵横,果决能断”,时为临澧令,经推荐,刘裕与之语,“甚异焉”,赞曰:“将门有将”,即加擢用,屡战有

功。<sup>[4] 136-1366</sup>兰陵人蒯恩,出自役门,充当马士,被选拔后,“诚心忠谨,未尝有过失,甚见爱信”,每有危急,“辄率先诸将,常陷坚破阵”。<sup>[4] 1436-1437</sup>王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有优允”,<sup>[4] 1317</sup>刘裕迁为宋国尚书仆射领选。谢晦善断,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sup>[4] 1347</sup>朱龄石“既有文武干用,又练吏职”,刘裕甚委任之,力排众议,选定为平蜀主帅,“猛将劲卒,悉以配之”。<sup>[4] 1422-1424</sup>刘穆之成为刘裕集团的首要谋臣后,“刘毅等疾穆之见亲,每从容言其权重,高祖愈信仗之”。<sup>[4] 1305</sup>王镇恶性贪,刘裕“以其功大,不问也”。<sup>[4] 1370</sup>刘裕的雅有人主之量,为该集团的发展壮大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主属之间基本上能够做到相得益彰。

重用血缘集团成员是刘裕政治力量的又一构成。他的两个弟弟刘道怜、刘道规,姨表兄弟刘怀肃、刘怀慎、刘怀敬、刘怀默,内兄弟臧熾、臧熹,舅舅赵伦之等都受到了重用。此外,刘裕也非常看重乡谊,对家乡(彭城和京口)也是照顾备至:义旗乍举,就以主簿彭城人刘钟领彭沛乡人赴义者组成义队,“恒在左右,连战皆捷”;<sup>[4] 1438</sup>又先后擢拔彭城人刘敬宣、到彦之,沛郡沛人朱龄石、朱超石等,委以腹心,加以重用。经济方面,先是义熙土断时规定,惟“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sup>[4] 30</sup>永初元年(420年),又下诏:“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义缱绻,事由情奖,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乡,加隆攸在,优复之制,宜同丰、沛,其沛郡、下邳可复租布三十年。”<sup>[4] 55</sup>这些措施既保证了刘裕集团的兵员补充,更为其提供了可靠的后方。410年刘裕再还京口,大治水军,皆“大舰重船”凭之大败卢循。

### 三

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政治社会化的深入发展,刘裕集团自然也在发生分化。逐灭桓玄后,同出身于次等士族的刘裕和刘毅,围绕着权力的再分配,矛盾逐步激化。407年,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刘裕派士族王谧薨,刘毅联合高门谢混和该集团骨干成员孟昶等人力阻刘裕入辅,试图把持朝政。在刘穆之的劝说下,刘裕及时入辅,于军权之外,又以侍中、录尚书事的身份(决策权和执行权兼领的身份)掌控了东晋中枢大权,成为了东晋王朝事实上的权力中心,而刘毅则被迫出镇豫州。409年,刘裕欲借消灭南燕以建立更高的个人威望,使得“和他同时起兵的刘毅等人及世家大族俯首帖耳,不敢与他抗衡”,<sup>[9] 367</sup>刘毅则以“宰相远出,倾动根本”<sup>[4] 1494</sup>为由,极力加以劝阻。410年初,卢循趁刘裕北伐南燕之际,再次起义,镇南将军何无忌败死,刘毅出动请纓,抗表南征,刘裕自然不想让他抢得保卫建康的头功,写信给刘毅:“吾往与妖贼战,晓其变态。今修船垂毕,将居前扑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sup>[7] 2207</sup>又遣毅从弟藩往止之,刘毅立功心切,急躁冒进,结果几乎全军覆灭,威望一落千丈。在卢循败退时,刘毅固求追讨,刘裕接受王诞密计:“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

与人分之。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sup>[4] 1492</sup>以毅监太尉留守府,事实上剥夺了他的兵权。此时,刘裕集团的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内部斗争也就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要内容。“刚猛沈断,专肆狠愎”的刘毅在朝中不能有所作为的情况下,只得另谋发展空间,上表请出方岳,及为荊州刺史后,“伺隙图裕”,“毅至江陵,乃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请(刘)藩为副。”<sup>[7] 2209</sup>又拉拢刘敬宣说:“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校尉),岂有见辅意乎?”<sup>[4] 1415</sup>对于刘毅的要求,刘裕表面上每“柔而顺之”,以骄其志,彰其恶,而知刘毅“终为异端,密图之”。412年,刘裕突然行动,处死刘藩和谢混,派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打着刘藩的旗号西击江陵。时“荊州编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sup>[7] 2209</sup>可资利用的人力、物力有限;刘毅仓促接任,立足未稳;而众又多恶其陵傲不逊,所以刘毅旋即败亡。该集团的另一个将领诸葛长民虽有文武干用,但“骄纵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宝美色,营建第宅,不知纪极,所在残虐,为百姓所苦”,<sup>[7] 2212</sup>预谋作乱,但又缺乏自信而迟疑不决,写信给刘敬宣说:“盘龙(刘毅小字)狠戾放肆,自取夷灭,异端将尽,富贵之路,相与共之。”<sup>[4] 1415</sup>413年,刘裕自江陵返回建康的第二天就诛杀了他。众所周知,刘敬宣素以忠贞见称,与刘裕更是“恩结龙潜,义分早合”,刘毅和诸葛长民之所以冒险拉拢,就是因为他们和刘裕的对抗中自感力量不足,欲借刘敬宣的威望来联合其他的北府旧将,共抗刘裕。清人王鸣盛说:“愚谓裕所同事者,无忌与毅皆雄杰,无忌败死,所悼惟毅,除之可得志于天下矣。”<sup>[10] 257</sup>刘裕和刘毅以及诸葛长民矛盾的实质是争夺该集团的领导权,进而掌握东晋军政大权。消灭了刘毅等内部异己,也就为刘裕的造宋代晋事业扫清了最大障碍。

东晋王朝是在南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是司马氏与世族共天下。以王、庾、桓、谢为代表的世族把持的朝政自然一切以维护高门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颜氏家训·涉务篇》说:“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仆射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sup>[11] 292</sup>干令升在《晋纪总论》中也说:“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sup>[12] 1501</sup>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高门子弟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故“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sup>[13] 118</sup>其衰败是必然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高门大族虽然让出了中枢大权,但是门阀士族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相结合的封建国家选官制度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动摇,政权中的绝大多数职位仍然掌握在士族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还是次等士族所无法企及的,他们的统治经验还是必须要加以借鉴的。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其本人“仅识文字且书素拙”;其弟道怜“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

鄙拙”；<sup>[4]1462</sup>其舅舅赵伦之“性野拙，人情世务，多所不解。”<sup>[4]1389</sup>在刘穆之卒后，刘裕经常叨念：“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诗经·瞻印》）又说：“穆之死，人轻易我。”<sup>[8]3735-3736</sup>这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刘裕对于刘穆之的深厚感情；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能看出刘穆之在这个集团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这个集团文治人才的严重匮乏。所以，刘裕还必须要联合士族以得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支持；还必须要依靠高门以壮声威；还必须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sup>[14]321</sup>刘裕举事伊始，就以司徒王谧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之后又先后重用了王弘、傅亮、张劭、谢景仁、王诞等高门子弟。而此时的高门士族在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下，不管是其代表人物，还是整个阶层的势力都衰落了，诚如王夫之所说：“江东自谢安薨……国之无人久矣。”<sup>[5]482</sup>在庶族集团已经控制了东晋中枢大权的情况下，他们“为了维护不坠的家门，只得在低级士族中寻找政治上的代理人”，只能放下架子，接受庶族地主的领导，学会与庶族地主合作，无奈地说着“既从神武之师，自使儒夫立志”之类的违心话，<sup>[9]587</sup>为庶族集团出谋划策，饰演捧玺绶、上劝进表，“将一家物与一家”<sup>[6]756</sup>的政治配角。

东晋末年，偏安一隅的没落世族已经没有了“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新亭对泣，<sup>[15]21</sup>而南渡的普通黎民的收复情结却挥之不去，留守北地的人民也是翘首期盼“王师北定”。刘裕的两次北伐恰好满足了南北人民的迫切要求，也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当王猛、檀道济在“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而刘裕又无暇补救的危急情况下，猛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sup>[4]1369</sup>三秦父老更是感叹地说：“残民不霑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sup>[8]3714</sup>刘裕的两次北伐收复了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为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掩护作用，也为“元嘉之治”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时人后世颇有赞誉：“然则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sup>[5]478</sup>刘裕集团的出现和壮大，得到了南北分裂下全社会的认同，人们不再排斥，而是开始接受其行为。410年，卢循兵临城下，刘裕率数十人还救建康，至淮上，向过往旅客询问朝廷消息，人曰：“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忧也。”<sup>[4]18</sup>及至建康，“裕见民临水望贼，怪之，以问参军张劭，劭曰：‘若节钺未反，民离散之不暇，亦何能观望！今复无恐耳。’”<sup>[8]363</sup>由此可见，这时的刘裕不仅已是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也已成为当时社会的精神支柱之一。作为新兴的庶族地主集团，刘裕集团在当时是进步的，他们能够打击士族的利益，也能暂时牺牲一些自己阶层的利益，把封建剥削限制在人民群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以赢得民心。404年，刘裕处死有“京口之蠹”之称的刁氏，并“散其资蓄，令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以济焉。”<sup>[7]1846</sup>东晋朝政松弛，豪强兼并土地、隐匿户口现象十分普遍，411年刘

裕处死藏匿千余人的会稽余姚虞亮，使“豪强肃然，远近知禁”，<sup>[4]27</sup>保证了义熙土断的顺利进行。对豪强大族“占山封泽，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的情况，刘裕也多次禁断。此外，刘裕在轻徭薄赋、息民简役、放宽刑罚等方面，也时有措置。《孟子·公孙丑下》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尚书·五子之歌》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小农经济，安定社会，保证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也巩固了刘裕集团的政治地位。

由上文可见，刘裕集团是一个以庶族为主体的士庶联合政权，它的发展趋势是逐步世族化。《宋书·郑鲜之传》记载：“高祖少事戎旅，不涉经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sup>[4]1696</sup>《艺文类聚》卷十四说：刘裕虽阙章句之学，却是“好清谈于暮年。”唐长孺先生也说：“他们（庶族地主）的最高愿望不是打破这种士庶区别，相反的是想挤入士族行列，乞求承认，并且转而以之自傲，甚至同样坚持士庶区别观点。”<sup>[16]109</sup>

#### 参考文献：

- [1] 魏 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翦伯赞，郑天挺.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古代部分（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 祝总斌. 刘裕门第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
- [4] 沈 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7]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9] 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10]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陈文和，校点.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11] 颜之推. 颜氏家训[M]. 王利器，集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2] 萧 统. 文选[M]. 李 善，注. 长沙：岳麓书社，2002
- [13] 肖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4]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5] 刘义庆. 世说新语[M]. 沈海波，评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6] 唐长孺. 南朝寒人的兴起[C]//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北京：三联书店，1978

(责任编辑：骆晓会)